

烟花三月见扬州

□廖奔

向往扬州,向往烟花三月的扬州,很久了。朱自清散文奖活动为我提供了机会。

现在的高铁真是神速,刚才还在春花初绽的北国,一忽儿就来到草长莺飞的江南了。

沿途一派清丽气色,越近市区越是如此,尤其瘦西湖附近,真正是满目秀色可餐。我想,扬州西湖之冠以“瘦”,大约有其审美上的通感功能。古人品石,强调“瘦、皱、透、秀”。要秀,先须瘦。朱自清心里惦着的江南曲曲折折的荷塘,就像瘦西湖一样瘦瘦的吧?

我一直从古诗词里感知着扬州,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就是两个字:清秀。

你想,当年李白烟花三月送故人下扬州时,眼睛里盈盈流动的,是一派对清明、秀丽的向往和憧憬吧。宋代词人姜夔则在《扬州慢》里袒露着留恋:“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我最爱唐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诗里清静澄明的时空、辽远无限的心境,原来他是扬州人,这就不奇怪了。后来识得几位扬州秀士,更加重了这一印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时,同班的孙汝、陈小鲁都来自扬州,让人眼睛一亮:原来这就是“秀才”。唱扬剧的名小生李政成,让人想到柳梦梅。

在我的印象里,扬州是和下述关键词连在一起的:扬州一益二,唐诗、史可法和扬州十日、扬州八怪、京杭大运河、盐商、乾隆下江南、戏曲。

“扬州一益二”是唐代形成的一个说法。唐代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为什么不是“长一洛二”?扬州文物兴盛,成都物产富饶,两家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足见安史之乱以后,中原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当时还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所以才有诗人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所以才有诗人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扬州有幸,唐宋一批著名诗人都和它有缘:张若虚、杜牧之外,白居易、欧阳修、苏轼也都在此居住或做官多年。或者反过来说,著名诗人常常和美丽城市有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有山塘街,又称白公堤,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调发民夫所筑;杭州西湖有苏堤,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所建。扬州呢?刘禹锡有一首七律,叫做《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乐天即白居易,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罢苏州刺史返回洛阳,刘禹锡也要和州(安徽和县)刺史返回洛阳,两个大诗人在扬州初次相逢,多高兴啊,于是喝酒欢宴。白居易在宴席上作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也写诗作答,就是“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那首,名句还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为什么去洛阳要经过扬州呢?大运河水陆码头嘛,江北第一站嘛,所以诗人来来去去。小城开封,唐代李白、杜甫、岑参都曾来来去去。诗人净去好地方,好地方招诗人。

史可法、扬州十日就是扬州的骄傲了:清军南下,势如破竹,一路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但明弘光元年四月(即清顺治二年,1645)到达扬州时,我的开封老乡、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坚决抵抗,誓死不降。清军损失惨重,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城破后,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十天屠城,死难80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原来扬州不止有秀丽,还有顽强和不屈,它撑起了民族的脊梁。知道这个史实之后,我对扬州人更是敬重十分。

清代画坛扬州八怪,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触摸到的艺术才杰了,金农、郑板桥,代表了当时中国艺术新的审美风气和趋势,影响到近现代。扬州很多博物馆、文化馆和各种课堂馆所里,都悬挂着他们的作品,这里一幅、那里一幅,或原作、或仿品,都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文雅之气。

京杭大运河,是扬州繁华的前提。唐宋时期建都中原要倚重东南漕运,明清建都于更北的北京更是如此。“苏湖熟,天下足”,东南漕米成为封

建中国的经济支柱,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则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动脉。大运河和运河文化繁盛,作为江北第一重镇,扬州成为其骄子。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小水湾天狐诒书》中描写说:“那扬州隋时谓之江都,是江淮要冲,南北襟喉之地,往来樯橹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真好个繁华去处。”

运河的东关古渡口,就在今天修复的扬州古城东门外。进入门楼,脚下都用玻璃隔着古代墙基,标记着唐、五代、北宋、南宋等,透着古老与今天的骄傲。进来就是东关街,一条布满商铺的古街,那些商铺的历史或可一直追溯到唐宋吗?我不知道,反正今天熙熙攘攘,蓬蕴着市井繁华气。在东关街吃汤包、听扬州评话,市意浓浓。一声界木,老艺人杨明坤拉开架势,如数家珍地将扬州“水包皮”的泡澡过程说得天花乱坠,让你听得云里雾里,恨不能立马进入澡堂子一褪陈皮。

漕运的便利,使扬州又成为盐业都阜。“扬州繁华以盐盛”(清黄钊《金壶浪墨》卷一)。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三块:田赋、盐税和关税。扬州附近淮河沿岸的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征收的盐课几乎占全国盐课总量的一半,所产之盐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尤其在康乾盛世时,两淮盐业发展到最高峰。顺治二年(1647年),清廷在扬州设立两个盐业官衙进行管理:两淮巡盐察院署、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设的两个官职,两淮巡盐御史无定品,两淮都转盐运使从三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康熙年间就任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曾奉旨任扬州天宁寺开设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

扬州盐商因而富可敌国,成了中国社会最为显赫的阶层,过着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清李斗《扬州画舫录》有载:婚嫁丧葬,饮食车马,动辄花费数十万金。吃饭时,夫妇并坐堂上,厨子准备数十道菜,由侍者一道道抬到跟前,不吃就摇一下脑袋,马上抬走,再换其他。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早上出城,晚上回城,蹄踵交道,观者聚堵。以木作裸体女人,动以机关,酷似真人,客来见之,惊避不及。运金箔至金山塔上,向风抛撒,随人轰抢。好美者,门口侍女以灶头丫鬟,皆由十几岁清秀女子承应,长大就换。好大者,用铜做成五六尺高原池,人尿尿须力就之。

盐商许多是徽商。徽商到扬州开辟事业,发了财,娶回“扬州太”,到家乡建屋宇、建祠堂、建牌坊。据说建牌坊的作用之一是为了震慑住“扬州太”的心性。扬州女生长于水陆码头,见多识广,性格也较为开放。徽商担心自己在外经商,扬州太在家里不守妇道,于是用牌坊来旌表那些守节义的扬州太给她做榜样。

今天徽州的古村落许多与盐商和扬州有关。我参观歙县棠樾村牌坊群时,听到乾隆后期扬州盐务巨商鲍志道的故事。鲍志道11岁为生计所迫,一个人出外谋生,20岁时搭乘一条商船到了扬州。最初在豆腐店记账,在盐场帮工,后为扬州盐



扬州瘦西湖五亭桥

記
手
心
也

沈从文在济南的“修道士”生活

□吕周聚

当时著名的作家、知名的大学教授,如果沿着这条轨迹发展,其未来是不可限量的。然而,历史和他开了个玩笑。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变化改变了沈从文的人生轨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这些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新的考验。在50年代,政府为这些知识分子举办学习班,希望通过政治学习来改变他们的思想,沈从文为此而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学习结业之后组织上要给沈从文安排工作。因为他是作家,组织准备让他到文联任职,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拒绝了。他要远离政治,于是就选择了放弃文学,主动要求到博物馆工作,和那些不会说话、与现实政治没有关联的历史文物打交道。从此,他在全国各地考察文物,渐渐淡出了文坛,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将自己比喻成“修道士”,形象地描绘出了他当时社会处境和思想心境。

在济南期间,沈从文到“人民公园”游览,到民众市场听评书,但这些地方留给他的印象并不好。他以文物家的眼光来看济南的建筑,认为电影院、山东剧院缺少民族形式,而欣赏博物馆的建筑(山东博物馆是古色古香的老建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形式。他最感兴趣的是济南人那种安静缓慢的生活方式,并表现出一种羡慕的眼光,“济南给从北京来的人印象极深的是清静。街道又干净,又清静。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似的慢慢走着,十分从容。”“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做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

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19561008致张兆和》)金秋十月是济南最美的季节,不冷不热,秋高气爽,应该说沈从文选择了一个最佳的季节来济南,济南将她最美丽的一面呈现给了沈从文。在他的心目中,济南如同一个世外桃源,恬静舒适,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给沈从文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靠博物馆很近的医学院,他看着学生们来来往往,产生了许多联想,发了一些感慨;一个是“新师范学院”(今天的山东师范大学),这儿给他留下的是以一种非常怪异、滑稽的感觉。他在四个助教陪同下参观文物室:

今天上午到师范学院时,正值午课教学,千百学生挤着出门上饭堂,我们在这些青年人中间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也极有意思。因为即“报上名来”,也还是没有明白你沈某是谁,做什么事,正和传达门房差不多,望望也不相识,一开口即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什么也不干”,他却笑了。必需遇到好事的,才问问“客从何处来”,听说从北京来,也只是怀着一点好奇神情,望望上下,可能最引起注意的还是我脚下一双学生鞋,证明和他们大伙是“同道”,因为许多人也穿着这么一双布鞋子。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个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19561010(2)致张兆和》)

曾经的著名作家、知名大学教授,在山东师范大学的师

行走



谁都知道陕北是历史上的兵家纷争之地,以至各个朝代兴修的古道纵横交错。那赫赫有名的秦直道,就是从咸阳的淳化起步,越过陕北黄土荒漠,直抵内蒙古包头的,想来其间的驿站必定是连成串。而这条连接榆林与包头的古道,当然也应该散落许多歇脚之驿站的,遥当年古道上的兵车和走西口的汉子络绎不绝,马头上的铃铛与赶车人悠扬的信天游,携着古道尘埃飘到驿站的房梁上,带给人们缤纷而迷茫的遐想。但是,川流的凛冽风霜还是把古道驿站砥砺得七零八落,现今人们若真要搜寻古驿只能从当地人的传说和地上的遗存里去考究了。可是,眼前这个文安驿却还顽强地在古道边矗立着,呼唤着久远的风烟和现实的抚摸。

羊肚子巾手巾三道道蓝,出门容易回家难。/走进驿站喝口水,/烂墙撞破我嘴嘴……

这座古驿竟是西魏大统年间所治,如今望去大约占地一百多亩,古时是有城墙围堰的,而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但不知何时竖起的一道浓缩陕北风情的石质牌坊,宽宽阔阔地立在古道北侧,一眼望去就知道里面当是一处古风荡漾的老地方。果然穿过牌坊就可见层层叠叠的窑洞顺坡而建,悄悄张扬着陕北独有的风韵。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一孔孔窑洞的式样略有差异,有的伸出齐齐的前檐,似将关中民居搬进了黄土崖,有如游牧风俗与农耕文化的精妙结合;有的压嵌着层层石板,粗糙而不失规整,泛着比黄土还硬朗的色泽;有的是青石砌就的门脸,敦敦实实一丝不苟,纵横的纹路且把富足展现;有的是平地起窑,有意将屋顶盖成拱形,以抒发古驿人对传统民居的执著情感。

在窑洞群中央坐落着一栋魁星楼,只有二层楼高,没有司空见惯的雕梁画栋,也没有斗拱挑檐,只有那朴素的红格方窗与那歇坡灰瓦浑然相依,似在诉说着曾经的难忘。当然,这栋楼阁在这片窑洞里显得鹤立鸡群了,只是楼里至今还空空荡荡,没有钟馗独占鳌头的塑像,也没有纪念哪位跌入凡界的文曲星之牌位。追何方知,这魁星楼还真是为纪念文安驿明代走出的一位进士而建的,区区一个进士何至于大兴土木呢?古驿人嘲笑我愚钝,这座小楼一起就聚起文脉了,上世那股上山下乡的风潮能汇聚到这,能在古道边演绎一段史诗般的蹉跎岁月,也许可以从魁星楼里找到答案呢。

真有这么玄妙?古驿人催促我上崖看看。我将信将疑,仰望后山坡上凸起的一块土崩,竟是披着千年风霜的烽火台。啊,古时烽火台多沿驿道五里一个,白天燃烟,晚上燃火,一簇连进一簇,便把前方的战况传至统帅营帐了,史上上围绕着这类军事设施不知发生过多少令人唏嘘的故事呢。于是我们沿着一条“之”字形的羊肠小道爬到土台根下,想瞧瞧古代烽火燃烧的痕迹。可是抬眼再看土崩还有八九米高,且已没有可以攀爬的痕迹了。然而,居高临下回身眺望,只见古驿南面有条山峪苍龙般蜿蜒纵深,其势灵动迢迢,其形威仪大度,里边可是别有洞天呢。

我恍然明白了,这文安驿附有四个山村,那峪口两侧是上驿村和下驿村,深处是为梁家河村,村村地畔都与文安驿牌坊相连,家家都能攀连上缕缕姻缘,所以过年闹社火四个村子必须齐齐转过,才能缓口气冒烟。而最让文安驿引以为骄傲的是,1969年春暖还寒,伴着阵阵卡车喇叭声,荒芜的山沟忽然拥来一群来自北京的知青,燕京的气息直把古老文脉弘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耕读声宏,阡陌绿厚。一群英俊的后生姑娘一头扎进文安驿,高举改天换地的旗帜,上演了一段深情激荡的活剧。

为解决吃粮难,他们带领村民筑起了这片高原上第一道淤地坝,果断拦住了悄悄流失的黄土,造出了近百亩水浇地。为解决吃水难,他们率领大伙打出了一口深水井,让全村人喝上了甘甜井水,从此收集雨水的地窖便荒废了。为方便做饭取暖,他们琢磨出了一口沼气池,还在旁边墙上绘制了一幅宣传画,手握铅笔的工人与背锄的农民兄弟仰望前方的辉煌,顿时搅动了穷乡僻壤。后来,这些后生姑娘们,在这布满沟岔的山村里住了一年又一年,终于向她们招手了。临走那天全村人都拥出来,为把心掏在文安驿的知青们送行,更有好多后生一直陪他们走到了延安城。

从此古驿人在脑海里增添了一个念想。村里小麦丰收了会写信告诉他们,麦穗翻滚,丰收在望;村里枣树挂果了会捎话告诉他们,果实甜美,红得鲜艳;谁家箍了新窑娶了媳妇会悄悄告诉他们,喜气盈门,请吃块糖;谁家人生了重病会小心告诉他们,可有好药,乞望健康;村里遭了灾也会告诉他们,灾后重建,旧貌换新颜,大家多么期望曾经在这里流过汗水的后生们能回来看看,瞅瞅村里的新窑,也瞅瞅文安驿的古道热肠。

一对对鸭子一对对鹅,一对对毛眼眼瞪大道。/千年古堡换上新衣,/好光景落到文安驿……

终于在春风拂来的时候,有知青回来了,整个古驿都为之振奋,树也生芽,花也吐蕾,一个古老驿站悄然焕发出青春光泽,也隆重呼唤着一个富集陕北特色的文化园区隆重开张。这就是文安驿的过去和今朝,古韵新风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全新诠释,也注定会永远镌刻在文安驿城墙上,浓缩进古朴的魁星楼里。我这时终于明白,古驿人的确聪慧,他们精心挖掘这方土地上的文化遗存,重修古香古色的魁星楼,把上世纪那么多知识青年的风采集中过来,正是要回溯沧桑古道上的历史交响,守望北京知青书写在沟畔上的不朽华章。

是啊,古驿人期待了上百年的梦想如今又伴随着朝阳,开始了更大更大的酝酿……

生中竟成了一个无名的“什么也不干”的陌生人,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酸楚。虽然他自己也很难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但他头脑非常清醒,“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这句富有哲理意味的话,一方面道出了沈从文的落魄心情,另一方面又道出了知识分子们的独立思想。

沈从文在济南接触最多的是当地在职有声望的第一流老文化人,其次才是文物,再其次是街上一切。这一切,都引起他内心的感慨,“到这里住了几天,虽然把初来修道士的幻觉慢慢去掉了,可是当真和社会一部分习惯隔开了。真是一种古怪的事情。”(《19561012(1)致张兆和》)他将自己假想成“修道士”,这既是对济南悠然自得的生活环境的想象,也是对其身份转换的一种想象。他已经告别了引人注目的文坛,幻想自己进入了幽静淡然的道观或修道院,过着一种清静无为的修道生活。

从著名作家、教授到“修道士”、文物工作者,从关注国家命运、思考人性本质到向往清静无为的生活,沈从文正在经历痛苦的人生转型。虽然此后他在文物研究中也写出了《中国服饰史》这样的著作,但这终究是他被迫无奈的选择。济南之行,沈从文开始了这种“华丽”的转身,但其“狂躁”的心情依旧在困扰着他,“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总像是对某一些当前所见、所感、所……要问谁叫叫:‘不成,不成,这样子下去可不成!’”嚷的或许是目前具体事件,或许只是所见的一种趋势。或许是属于目前业务部分,或许和业务不相干的一点点什么。”(《19561013致张兆和》)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清静的“修道士”,但他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痛苦,充满了无声的号叫。这种无声的号叫,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